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隨着近年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新冷戰」之說一時不脛而走；在最近俄烏戰爭爆發以後，一股逆全球化的旋風更急速颳起，對未來國際格局勢將帶來深遠影響。中國能否通過加速數字化轉型克服未來的挑戰？我們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就此課題惠稿敝刊，以饗讀者。

——編者

「合作而非衝突」的研究視角

在近代中國，西醫東漸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下稱基金會)在華開展合作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

胡成的〈「清除鈎蟲病」的跨國合作：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萍鄉(1914-1919)〉(《二十一世紀》2022年2月號)一文，聚焦於基金會成立後與中國政府初次合作，在萍鄉開展鈎蟲病防治這一重要歷史事件，通過對中外史料的廣泛搜集與詳盡解讀，首次梳理並呈現了合作緣起、前期準備、機構遴選、人員甄別、項目推進、取得成效等歷史面相，填補了現有研究的空白，為學界貢獻了精彩的研究成果。

跨國、跨文化視野的研究取向，是胡成的一大研究特色。這在其代表作《醫療、衛生與世界之中國：跨國和跨文化視野之下的歷史研究》一書中有着淋漓盡致的呈現。作者在書中指出其一直努力從醫療史、衛生史的角度切入，考察有關議題在外來/本土、東方/西方、帝國/殖民、侵略/反抗等相關的「各種糾結和纏繞」，進而考察「普通民眾或地方社會如何應對、怎樣處理，以及發生了甚麼樣的事件、產生了怎樣的認知，並有甚麼樣的歷史意義」。顯然，該文的寫作是作者秉持此一研究旨趣的又一成果。作者早年在美國訪學期間，曾在洛克菲勒檔案館遍覽基金會與近代中國各方往來的一手資料。這些資料構成了本文的核心史料，也使這一研究成為可能。

胡成也是當前中國大陸醫療史學界有着高度理論自覺的學者之一，在這篇文章中也有着鮮明體現。作者不滿於一般學者在相關議題探討上往往採取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的研究範式，而是希望尋求一種更具超越性、包容性的研究框架，提倡「盡可能將外來、在地與本土連接拉入歷史的聚光燈

之下，更多關注各方的合作、分享、共有和互惠」。在這一視角的關照下，基金會和民國時期的中國當局在鈎蟲病防治行動上表現出相互合作的熱情，很好地推動了這一有益於中國國民健康的項目順利展開。作者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合作而非衝突」的研究視角，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既有研究中視角的單一與不足。胡成的這一研究不僅有着積極的學術價值，也有着一定的現實省思意義。

馬金生 北京

2022.2.21

史學家的重要使命

歷史資料是史學的基礎，還原歷史資料的形成過程亦是史學家的重要使命。特別是關於中共以及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歷史資料，更需要注意其形成背後的來龍去脈。對中共而言，歷史資料是論證其正當性與合法性的重要工具，相關歷史資料的編纂工作必然受到同時代意識形態的左右，其選篇、內容增刪、出版渠道等細節都暗含着特殊的政治目的。

黃江軍的新作〈經典重構：《毛澤東著作選讀》與1960年代中共意識形態的變動〉(《二十一世紀》2022年2月號)便是關注歷史資料形成過程的實證分析。眾所周知，在以往的國際學界，日本學者對毛澤東文獻細緻入微的考證分析可謂獨樹一幟。從老一輩的今堀城二、竹內實，到如今風頭正盛的石川禎浩，無不是考證中共文獻

的佼佼者。相對而言，中國學者受環境所限，且背負着意識形態的枷鎖，在探查歷史資料形成過程等問題上鮮有出類拔萃的作品。然而，黃江軍的研究別開生面，其博士論文〈《毛澤東選集》編輯考〉便是扎實的考證之作。顯然，本文是黃江軍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有力續作。

黃文結合1960年代前期中國政治發展的大脈絡，詳細考察了《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種本的緣起和編纂、出版的具體過程。經過複雜的考證，作者發現《選讀》淡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相關論述，突出了哲學方法、人倫精神相關著作的重要性，進而造成毛澤東著作經典形態的重構。作者認為《選讀》的編纂特點，反映了毛澤東在面對國內外的種種困境（大躍進的失敗與中蘇關係惡化）之下，希望從思想認識、精神改造、倫理重建等意識形態議題中尋找答案的政治訴求。可以說，《選讀》既是當時激進意識形態的產物，又是促使本已激進的意識形態更加激進的催化劑。

如果說《選讀》的編纂反映了1960年代前期中國的意識形態走向，那麼在毛澤東去世之後，1986年重編《選讀》，1991年發行《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又折射了何種政治訴求？特別是《選集》第二版的附錄竟然收錄了並非出自毛澤東之手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又是何意圖？另外，黃江軍認為，《選讀》的編纂工作也反映了該書主要編者——毛澤東

的秘書田家英高度敏感的政治嗅覺。而田家英不久後卻留下「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的遺言，自縊於中南海永福堂。這實在是莫大的諷刺。

周俊 東京
2022.2.24

血緣文化機制的作用？

陳意新〈政權、宗族與生存：大饑荒時期安徽宣城縣三寶里村〉（《二十一世紀》2022年2月號）一文在運用大量第一手文獻和結合田野考察的基礎上，對三年困難時期安徽宣城縣三寶里村村民如何生存這一問題展開深入分析，文章論證扎實，邏輯嚴密，結構完整，是學界近年對於這一論題研究的重要著作。總體來說，該文有三個層面的學術價值：一是研究視角。正如作者在開篇指出，以前學界對於三年困難時期的研究大都旨在闡釋「死亡」，該文反其道而行之，關注的則是「生存」。這個視角對於人們從整體性認識這段歷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二是研究對象。與學界既有研究側重於以省或縣域為考察對象不同，該文以安徽一個村為對象，將研究現場拉回到具體村落，從村莊宗族的角度入手，分析此時期農民的生存邏輯。三是研究框架。該文從縣級政策、村莊權力和村內管理三個維度，呈現了三寶村農民面對政治高壓與生存困境矛盾之間的「常」與「變」。

根據文章敘述，在三寶里村的人口結構中，以許氏兩個分支即楊四公房和迪七公房為主要構成。大躍進時期楊四公

房掌握了村莊資源配置權，例如擔任排長、副排長、食堂事務長、炊事員等，熬過食物短缺期而生存下來，而迪七公房則因與楊四公房歷史上存在矛盾衝突，在村莊政治舞台不斷被邊緣化，導致很多人未能渡過這一困難期。作者據此得出本文的核心觀點，即以宗族為核心的血緣文化機制是三寶里村尚有生還人口的主要原因，並且認為這一機制是從村級層面理解此時期中國農民生存與死亡的主要途徑。

作者認為血緣文化機制的存在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尚有生還人口的重要因素，但在當時村莊組織軍事化已經打破了這種血緣關係紐帶的情況下，本文似乎過於突出了這種關係對於農民渡過困難的作用。因為若按照這個邏輯，為甚麼同屬許氏分支的迪七公房人口卻損失嚴重？或許，這可以解釋為兩個分支之間存在歷史上的積怨，但文中也證明兩個分支在面對集體利益受損時卻又能團結一致。照此推論，當迪七公房成員面臨嚴重生存危機時，楊四公房應該及時伸出援手，但事實上為何後者幾乎沒有作為？因此，文中對於血緣文化機制幫助農民獲取生存資源的觀點只能適用於楊四公房，而不適用於迪七公房。相反，三寶里村附近的東皋村，因為領袖人物放任村民偷吃山芋種和菜籽餅，才使該村三分之二的人口渡過難關。可見，村莊領導人執行上級命令的差異，應該才是闡釋這種生存現象的重要切入點，血緣文化機制更多的是起着輔助而非決定性的作用。

何志明 成都
2022.3.2